

大学生毕业不包分配引出的社会现象——

父母为子女走后门明显增多

潘涌

一般来说,大学生对政治、对祖国的命运前途有比较强烈的参与意识,理应是改革坚定的支持者和积极的参加者。但是,不少大学生却不屑于读大学,毕业后不要求分配工作,而是“骑驴找马”,干一份挣一份钱,一份一份地制定规划。尽管多数大学生赞成改革分配制度,但同时又认为改革的时机尚不成熟,改革应循序渐进。

他们的忧虑,不无道理。时下的大学气候,能使毕业生分配制度的改革招到与理想相称的大学生吗?

尽管有一条不一定合理但对任何人都发生作用的死分死统,有章可循,经过过程后能看到的现象并不罕见。对此,既难以防范,也无法遏止。然而,到了分配时,连这样一条“死线”也没了,合理、公平、平等?既然入学有死分死统,且不能机动等,分配的情况自然可想而知了。不但不分,双向选择,道理上是很对的。但眼下社会风气不好,又

学是考考,找在是考考,退一步说,即使找工作好了,目前一些领导素质质不高,不能慧眼识人,也使分配工作难以公平。去年,在北京,一个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会议上,有一“骄子”是因为不拘小节,一位企业家曾表示:感到求职的女大学生,我喜不喜欢,穿裙子,不是牛仔裙,有几个穿牛仔裙,我们都要不要!一件衣服决定了人,的命,这大概算几位同学改革分配制度,本来是要给毕业生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但目前的分配情况,却很难给毕业生平等的竞争机会。一位门生有草率山,更不用说,有的,则更须出出身解后门关系来竞争。看来,改革要出招,还须作出更周密的配套规定,以遏制那些空子的入的对策。

(作者单位:北京市统计局)

希望? 忧虑?

赵爱晶

都已有利。常言道,时不我待。为什么这该做的事不去快干,非要让我等着去领那张文凭呢?难道有了文凭就等于有了真才实学?

六弟语调激昂。我却觉得,他把创业看得太容易了。比如:如何征地?在哪建厂?资金从何而来?技术力量?工人食宿?上下渠道……这些都考虑好了吗?还有,他是否想过扔了“铁饭碗”以后可能给他带来的种种后顾之忧?……我以过来者的口气,把这个问题给他摆出来,促他三思。谁知,弟弟对我所提的问题,对答如流。看来他是“蓄谋已久”,他急切地对我直言道:“哥,看来你还是不了解我。我的个性就喜欢置之死地而后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风险,我却认为这是一种创业的动力。人各有志。为什么不是非得在老一条已经路穷的路上走,而不是一开始就开辟一条新路前进呢?”

对弟弟的这一抉择,我很难简单地用错和对来判断。改革的大潮给平静宁静的校园里掀起的这种激动和不平静,究竟是我们民族的一种希望?还是一种忧虑?我说不清楚,但又很想得到答案。

(作者单位:太原市太行仪表厂)



《青年热门话题》有征文由共青团中央、华北制药厂和本报联合主办。

弃学办实事

赵爱晶

父母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的事发生了。弟弟寒假回来,突然向父母摊牌:他要中途辍学,回家乡办石料厂。我们只剩一学期就要端上“铁饭碗”的弟弟,突然做出这一抉择,对于年龄已60开外的双亲来说,无异当头一棒!母亲先是痴呆呆地愣了半晌,继而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出声来。弟弟却一脸平静,又没深没浅地蹦出一句:“你们权当我这三年半是白过了,就不想开了。”父亲越发觉得说不出话来,望着身高马大的儿子,打又打不着,只好坐在那抽闷烟。母亲自己“回天无术”,又“搬”我上阵。

然而,我的思想也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打心眼里佩服弟弟这种勇于创业和拓展新生活的勇气。另一方面,却又隐隐为弟弟的这一抉择惋惜和遗憾。我想到,弟弟的思想“滑坡”得真挺快。他是1985年9月才从县城考入北京钢铁学院,那时,他的思想挺得就像蔚蓝蓝蓝的,他钟情的是及学位、研究生和出国深造……曾几何时,他的思想竟出现了这样大的落差!

那晚,我打算和弟弟谈一谈。谁知,弟弟还说我“火发心”,倒先发制人,他说:“哥,你才工作了几年?思想怎么也变得这样谨守旧日。你还记得吧?《第三次浪潮》中讲:人,只有找到最佳选择,才能真正实现自由。现在咱们家上马的厂,是‘国家’八五’计划的重点项目,仅投资就几千万呢!一破土动工,需要多少砖、灰、石、料,咱们家乡最缺少的就是建筑业。我在学校学过硬企业管理,回家乡办个石料厂’,于国于家,都有利。常言道,时不我待。为什么这该做的事不去快干,非要让我等着去领那张文凭呢?难道有了文凭就等于有了真才实学?”

六弟语调激昂。我却觉得,他把创业看得太容易了。比如:如何征地?在哪建厂?资金从何而来?技术力量?工人食宿?上下渠道……这些都考虑好了吗?还有,他是否想过扔了“铁饭碗”以后可能给他带来的种种后顾之忧?……我以过来者的口气,把这个问题给他摆出来,促他三思。谁知,弟弟对我所提的问题,对答如流。看来他是“蓄谋已久”,他急切地对我直言道:“哥,看来你还是不了解我。我的个性就喜欢置之死地而后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风险,我却认为这是一种创业的动力。人各有志。为什么不是非得在老一条已经路穷的路上走,而不是一开始就开辟一条新路前进呢?”

对弟弟的这一抉择,我很难简单地用错和对来判断。改革的大潮给平静宁静的校园里掀起的这种激动和不平静,究竟是我们民族的一种希望?还是一种忧虑?我说不清楚,但又很想得到答案。

(作者单位:太原市太行仪表厂)

加强党内监督是党政廉洁的重要保证

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 聂荣贵

警钟常鸣,不要等到问题严重了才来处理。再就是本身要作出榜样,做到一级带一级。

二是党委成员、领导班子里的相互监督。班子内部要经常交流情况,交心通气,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过好组织生活,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当前,一部分领导班子里的组织生活不正常,开展不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一些错误现象放任自流,遇到一个题敷衍了事,调和折衷,或者“绕道走”,怕得罪人,搞一团和气,不敢坚持原则,搞例外。我们要克服这种自由主义的态度,积极开展健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经常清除思想上沾染的“灰尘”。对于班子内出现的腐败现象,不能“官官相护”,要进行旗帜鲜明的斗争。

三是党员群众、基层组织对上级党组织的监督。党员领导干部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怎样才能保持党政机关的廉洁,近年来已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也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作为执政党,我们的许多党员担负着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领导职务,各级干部也都是共产党员,手中掌握着大大小小的权力。从云南党政机关近年来发现的腐败现象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权力与金钱的交换。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如何对权力有效的监督。权力具有两重性,它既可以为我们的干部提供发挥才干的条件,用得更有效、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谋福利,同时又具有腐蚀性,可以被个别思想不纯的人用为为自己谋取特权和私利,侵害国家和群众的利益。中外历史上,现实生活中无数的史实反复说明,没有切实有效的监督,权力很容易导致腐败现象的发生。

党政机关出现腐败现象,原因比较复杂,必须进行综合治理。关键要加强监督,发挥人民监督、社会监督和党组织的监督作用。包括行政的、法律的、舆论的、社会的监督等等。对党员干部来讲,很重要的也是加强党的监督。这对廉政建设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党内监督主要有四种形式:

一是上级党组织、上级领导对下级党组织和下级干部的监督。这就需要一级抓一级,把党管党、从严治政落到实处。首先要经常了解下一级在这方面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发现问题及时提醒,做到

子只能盖一床被。就这么几年的工夫,他家靠养猪、宰猪再加责任田,先后盖起5套房,大的四个屋子都已娶了媳妇。何老汉谈到今年改革变化时说:“要是以前那副穷样,我那儿子们都得打‘光棍’。”

党员干部是主要教育对象

从表面上看,组织干部到基层开展形势教育,教育对象是群众。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干部到基层去,用群众身边的事情,亲身经历,总结十年改革的成就,平等地同群众探讨、分析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干部本身也受到了教育。市公安局通过形势教育,根据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改进派出所治安管理工作,从增加人民群众安全感等方面,进一步落实了从严治警的措施。南马乡税务所所长指出“抽烟自己买,吃饭自己煮”,坚持为政清廉。税务局局长告诉我,抽烟、吃饭说起来都是小事,但做好了很不容易。你现在可以到南马乡去看一看,没有一名党员干部抽香烟,也没有一个人到个体户饭馆里吃饭。这样,他们的工作也就好做了。

党员干部对改革的认识,对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问题所持的态度,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很大。金生桂巷厂在民意测验中有一位老工人反映,对政府部门中的腐败现象,不光工人、农民有意见,各级干部也有自己的不满情绪。他认为,现在最缺少的就是“从我做起”。

在州城采访时,我先后见到了松林镇党委书记张玉成和边各庄乡党委书记陈辉,他们对形势教育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要把各级领导和广大党员作为形势教育的主要对象。党员干部思想统一了,就有了凝聚力,群众的事情也就好办了。

漳州市委提出,形势教育要搞实际情况,说实在是在道理,实实在是在事,以达到明理、消怨、鼓舞的目的。他们利用市、乡党校,先后对各级干部和全体党员普遍进行了轮训,紧接着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民主评议干部”、“民主评议党员”活动。去年底以来,全市对42名不合格党员进行了组织处理,对156名基本不合格党员落实了专人帮教措施。根据民主评议和组织考察,全市对128名干部的组织进行了调整,7人受到降职、免职处理。这些措施与形势教育相配套,激发了党员干部的责任感、紧迫感,一些乡、镇还主动开展了“干部形象”、“党员形象”的讨论。

目前,漳州市各级部门正从群众意见集中、问题着手,进一步改进工作。今年,全市共用于农业的投资将达到1000万元,其中市财政投资比重比去年增加50%以上。市化肥厂扩建工程落实扩建后,将改变目前年产3万吨合成氨的状况,具备年产3万吨合成氨的能力。全市55个单位的1365名科技人员,在市、乡、村形成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有421人同基层单位和个人签订了各种承包合同。农业生产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将会很大程度地得到解决,为夺取今年农业丰收奠定了基础。

廉政不能留“特区”

新华社记者 张百新 尹建华 王进业

1988年6月20日,山东省地委书记王乐泉在地区1500名党政干部大会上作关于为政清廉的报告,公布聊城地区廉政建设首先从群众反映强烈的吃吃喝喝、滥用公车风和公款送礼风入手。

然而以排斥“四风”为发端的廉政建设,却把“三风”业以排斥在外。

几天后,一些厂长、经理纷纷来找王乐泉书记问:“地委为什么只让党政机关廉洁治党,而把我们厂‘企业例外’?”

答:“我们是经济发达地区,在气候还没优化的情况下,担心一搞廉政建设,会束缚企业的手脚,所以对企业留有余地。”

厂长、经理们不理解地委的用心,但同时也指出,企业成了不搞廉政建设的“特区”,那些管人、管物、管企业的党政部门会以借此为借口吃我们头上,把负担转嫁到企业身上。

厂长们并不是多余的。一些部门见企业留口子,便打着经济交朋友的幌子到企业吃吃喝喝。地区建筑公司的一个饭店开张,前来“祝贺”的有工商、税务等等,就连地委机关党的干部也多为座上宾。

说话之间,那浩浩荡荡的车队绕回来,进入模拟市区道路行驶。那一辆辆车驶得正欢,路旁一所房子,窜出一个穿花衣服的小孩,奔跑到了马路当中。只听“嘎”地一声长嘶,汽车猛地刹住了!与此同时,“小孩”停在了马路当中。当汽车启动,

“汽车兵”训练场上

本报记者 罗同松

通过。

趁汽车队远去山区的时机,我和刘玉增攀谈起来。他:“有气魄,你们集团军会得花血本!”高个子幽默地说:“当初部队现代化程度高,汽车兵多。我们集团军里,平均6个成员中有1个汽车司机。要是经过严格训练,部队难以运动,搞不好还翻车撞人。所以我们决定,莫不如加点资,搞个象样的训练基地,提高汽车司机的素质,随时开得出,平时少闹锅,这就叫跳出战斗力,又出经济效益,何乐而不为!”

说话之间,那浩浩荡荡的车队绕回来,进入模拟市区道路行驶。那一辆辆车驶得正欢,路旁一所房子,窜出一个穿花衣服的小孩,奔跑到了马路当中。只听“嘎”地一声长嘶,汽车猛地刹住了!与此同时,“小孩”停在了马路当中。当汽车启动,

“风起于青萍之末”。鉴于此,地委便对廉政建设作了补充规定,宣布企业也例外,同样要保持廉洁。

开始有人说,这么一搞会吓跑了“财神”!还有人说,“生意经”少了请客送礼这一页就难念了。

8个月过去了,事实如何呢?

聊城棉纺织厂厂长吕绵岳告诉记者,他空着手到上海谈生意,回来带回一平“两头在外”的大买卖。棉纺织厂去年利税70多万元,比上年翻一番,不是请客送礼,是靠技术改造,开发新产品和提高产品质量。

据统计,去年下半年聊城地区企业“活动经费”比上年同期减少了75%以上。

聊城地区的实践说明,管不住企业,就管不住党政机关。因为党政部门既管企业的人,又管物。

王乐泉同志十分感慨地说:“搞廉政建设,不能强调哪个方面特殊,要上下左右齐动手,一留‘特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就难以建立。”

准备为“孩子”身后继续前进时,谁知那“孩子”一阵风刮来之后,折转身子往回跑。“啊呀!”我不禁叫起来。刘玉增却笑着说:“那是模拟行人,全部动作,可以做出奔跑、慢行、摔倒、犹豫等等动作。”

去过汽车司机训练基地的学员说,场地上有许多车,让司机开在车行中穿行。那样,考个学员,得有一个人伺候。今年,淮海汽车司机训练基地的整个训练场,也插着32根长竿,但场地上空无一人。有位教员坐在几百米开外的教室里,看着电子计算机终端器的荧光屏。学员驾车通过栅栏杆,其一举一动,都在教员眼前的荧光屏上显示出来。这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一台用于汽车司机综合技能考核的电子计算机。这个汽车司机训练基地每年可以培训700名学员,还可以对各种车辆司机进行短训和考核,对管车人、监理人员以及汽车修理工进行培训;这里不但训练部队汽车兵,还已经承担了地方单位汽车司机培训任务。这里有一支业务水平很高的教员队伍,凡是我国装备了的汽车,其驾驶员都可以在这里进行训练。

主动自觉接受人大政协监督

刘清敏

在监督机制尚未健全情况下,大连市市政府制订措施

刘清敏

人大和政府实行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政协对政府实行民主监督,如何使监督机制避免走过场,真正发挥切实有效的作用?在我国目前监督机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关键在于市政府要自觉地接受人大和政协的监督,尊重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的民主权利。

一年来,辽宁省大连市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在为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提出批评、建议和提案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甚至对政府有些什么,各自的职能是什么也不清楚,提出的批评、建议只能局限于身边的事情或一些表面现象,难以对政府工作进行实质有效的监督。而要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知情,就离不开政府的政务公开。

大连市从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入手,为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知情提供条件。去年,他们由去年一次在人大常委会上报政府工作,改为半年过后邀请在大连的200多名党、省、市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到市政府、党委、向他们全面汇报市政府上半年的工作。市政府和部门的领导经常通过座谈会、研讨会等形式,向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通报分管的工作。除此之外,凡是市政府召开的常务会议、现场办公会、专项工作会议以及到基层检查工作,都邀请部分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参加。到去年底,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已有近千人次参加了市政府的各种会议和活动,写出批评、建议和提案800多件。

重大决策之前请监督

参与决策是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内容。如果政府把它仅仅看成是例



10年来,北京市丰台区副食品公司团委80个学雷锋小分队,坚持走街串巷,为居民点或医院病房送货上门。队,小分队的送货车又出发了。

徐州,淮海汽车司机训练基地。

佩戴陆军大校肩章的刘玉增去参观。这天,正逢一批学员进行毕业考核。3发红色信号弹划破长空,只听马达声从教学大楼后边的停车场呼啸而来。顷刻,大地烟尘滚滚,遮天蔽日,100台卡车一辆接着一辆上路。走在最前面的那辆卡车驶不远,便钻进了深坑,仅露出了车篷顶。

后边的车辆相继通过沙水路时,第一辆汽车已从高架桥上通过去了。高架桥看上去有2米高,桥面是两根钢轨。我对刘部长说:“60年代军队搞大比武我见过汽车走钢轨的场面。”刘玉增这时似在屏声静气,只是用带着胡茬的下巴朝高架桥方向努了努,示意我认真看汽车走钢轨。这回可是100辆啊,一辆也不脱轨,刘玉增不禁叫绝。汽车依次登上渡槽,渡过河对岸,便进入土木模拟行驶路线。那辆模拟行驶,无非是模拟坑、路障啊,泥泞路面啊,以及诸如拖灰板形形的路面等等。车队通过这些道路,便进入山区。22里长的山区道路,备有各种坡道、弯道和窄道。悬崖边有的路段,汽车要开倒车才能



党的生活

五四精神的真谛

重大的纪念活动，往往同时是一种重新反思和叙述其意义的阐释活动。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不同时代的背景下，对于五四精神的强调重点，常以当时时代政治热点的不同而不同。50、60年代，我们强调的“五四”方向是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方向。

70年代末开始，人们重新关注的则是五四精神中的启蒙与民主——“思想解放”。

80年代我们纪念“五四”，人们关注的似乎集中于三点：民主、科学，以及反封建。但是，问题在于，对于这三点，我们今天是否也有必要重新再作一番认真的反思！

自从五四运动陈独秀提出科学与民主，已经七十年来，为什么今天中国需要的还是科学与民主？自从吴虞提出打倒“孔家店”，鲁迅喊出痛绝吃人的旧礼教，也已经七十年来，为什么今天还在呼吁：“反封建”和批判中国的旧文化传统？难道七十年来中国历史，仅仅是原地转了一圈吗？

如果更深刻地剖析一下，我们会发现：所谓“科学”、“民主”、“反封建”，这些似乎很正确的提法，其实又是很抽象的。正因为其抽象，所以永远正确。但也是因为其抽象，人们可以对其赋予也许完全不同的涵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一个历史事件意义的估价，应当看这一事件最终结出了什么样的历史果实。七十年后重看“五四”，我们不仅应当考虑当时的先驱者们曾提出过什么任务，还应当问，由“五四”所带动的一系列后继的发展中，中国实际解决了哪些问题，没能解决哪些问题，又引发和遇到了哪些新的问题。

“五四”的旗帜是民主与科学。中国今天当然不能说还没有自己的“民主”和“科学”。有人说，虽然有，但是程度还不够。然而，怎样才能算“够”呢？

怎样为，真正的问题也许在这里：既然在“五四”先驱者所理解的意义上，中国已经突破、甚至冲破了它的旧传统，既然中国已经具有和建立了某种科学的科学与民主（这是无疑的），既然中国早已有了个所谓“封建制度”，那么为什么中国直到今天还没有现代化呢？这个问题才是困难的真正所在。

现代化意味着文化形态的重新塑造

十九世纪初期，中国在自己似乎毫无准备的情势下，被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推入了世界洪流，不得不寻求变革和适应。中国由此痛苦地进入了一个不断探索、追求现代化道路的漫长过程。如果从1840年算起，已近一百五十年了，中国却还挣扎、奋斗在这个艰难的路程中。

五四运动就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重大的事件。以我所见，“五四”的意义主要在于以下诸点：“五四”以后，精英分子追求中国变革的意愿，曾分别集中在军事“强兵”、“经济”、“技术”与工业、实业救国、政治等方面，由发生洋务、戊戌、辛亥等变革和革命的运动。但是，在这些运动先后失败的基础上，五四四期那些号称“新青年”的精英人物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迅把目光转移到文化形态、社会制度、价值体系、意识形态上来，从具体深入于抽象，从物质进入于精神。由此

“五四”精神的继承与超越——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思考

何新

提出了改造国民灵魂、国民意识和民族性格，以及国格与人格的问题。

“五四”以前，国人多着眼于从旧制度和传统文化的大框架内求取社会中若干枝节的现代化（这就是所谓“中体西用”的深层含义）。直到五四运动，才提出了文学革命、文化革命、社会革命的口号，试图实现文化形态、社会制度的全面转变和改造。这是一个深刻的飞跃。但是，文化是一个很不容易确定的概念。所谓“中国文化”，泛论之似乎不难理喻，但细察之则实不然。事实上，文化在不同时代呈现的形态和价值观并不完全相同；不同地域与文化也呈现很大差异。所以，笼统地讲继承、否定或扬弃，均有简单化之嫌。

我以为，中国文化就其自身标准看，曾经是相当成功的。它是人类农业文明中极具有适应性，其内部组织功能的一种高水乎文化。近代中国文化所遇到的问题，主要是作为一种农业类型的中国传统文。由于与西方的科技—工业—市场文化的冲击和对比而现出落后、不协调，因而不能不提出“现代化”，即跨越自身构造一种中国的科技—工业—市场文化的要求。

所以，现代化必然意味着文化形态和文。整体性结构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除了中国人的民族本体意识应当保持（不保持就没有凝聚力，国家、民族就难以存在）外，一切都可以扬弃、改造和重建。社会的变革，往往是先整体（设计），后部分（具体）。意识形态、文化精神的转变应该走在经济、政治、社会改革的前面。没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就不会有西方的现代化运动。没有五四运动，也不会有北伐战争和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而缺乏文化精神和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转变，却正是当代改革陷于被动局面的原因之一。

建立现代化文化必须有根、有土壤

文化变迁对于现代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十九世纪以来所有国家现代化的历史都表明，现代化不能自一个社会外部而内部作直接的嫁接和移入。西方先进的技术、实业、科学、社会形态自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渊源。它是从西方古代的希腊、罗马以及希伯来传统的背景上，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思潮的背景上，自然而且必然地生发出来的。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现代化，也应当从中国自身社会文化背景的创造性转变中，有机地、合于逻辑地生长出来。

有人担心，新一代学者中有人提出，有必要冷静、深刻地反省“五四”，特别是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倾向，会导致对五四精神的否定。

实际上，“五四”的伟何须辩护？二十世纪中国的几乎整个历史，都笼罩在五四精神的深远影响之中。我们已经在70年代末重新提出“四个现代化”问题的時候，我们实际上是在新的历史水平和意义上，不自觉地回归到一个前于五四时期的问题

劳动价值论置于不可动摇的基础上。马克思的

经济理论体系，是以劳动价值论贯彻始终的。离开劳动价值论，也就不可能发现剩余价值规律。

《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它所阐明的经济规律，能适用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吗？这要具体分析。商品经济有共同规律，比如价值规律。它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同性质的商品经济又有其特殊规律，比如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规律，就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但是，如果抽掉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即剩余产品）的分析，特别是作为它的转化形式的利润、利息、地租等经济范畴，也可以适用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1921年，列宁对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中所说“在资本实行统治的条件下，生产是剩价值的生产，是为利润而进行的生产，在无产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下，生产是为抵销社会需要而进行的生产”一段话，作过如下评论：“没有剩余、利润也是满足‘社会’需要的。应该说：在这种条件下，剩余产品不归私有者阶级，而归全体劳动者，而且只归他们。”列宁对《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第41—42页）在这里，列宁告诉我们，只要分清生产关系，《资本论》所阐明的一些范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然可以使用。

是的，马克思明确说过，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将不存在商品和货币。但是，作为辩证唯物论者，他并没有把这一论断绝对化，在他的著作中还留下丁若干供后人进一步探索的思路。在马克思逝世的前两年，他写过一篇题为《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声明，他研究价值时，涉及的是资产阶级关系，并没有涉及到“社会主义国家”实际是指社会主义社会。他假定，如果由于歉收，粮食的价格超过价值的钱，那么“社会主义国家”超过的程度肯定会小于粮食囤积商（实际指资本主义社会），因为“社会

——“体”与“用”的问题。因为我们曾试图在现代已构建定型的制度、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即整体文化背景（是谓“体”）基本维持不变的前提下，自外向内地移植四种有用的要素：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军事技术、现代科学（是谓“用”）。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发展，事情就变得愈来愈明显，在不变革某些“体”的条件下，现代化与旧的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发生了愈来愈深刻的冲突。由此再度发生了重新启蒙，即反对蒙昧主义的需要——当时我们称之为思想解放。而正是在思想解放深化的基础上，新一代人再次意识到“五四”的精神：现代化不是简单的体用问题，现代化必须有根、有土壤。这与土壤应当出现在中国社会文化形态重新整合与塑造的过程中。于是，80年代又一次重现了“五四”的时代。历史的确是螺旋式地发展的。就这一意义说，8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文化热，的确可以认为是五四精神的直接接力 and 继续。

然而，历史的发展毕竟令人感到憾感。如果我们仍然不过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重弹七十年前的老调，那么这只能表明80年代中国新一代知识精英的贫乏和无能。

我们应当说：“五四”是伟大的但是我们必须超越“五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五四”先驱者留给后人而至今仍未完成的伟大历史使命：让中国早日实现现代化。

激进反传统不利于现代化

五四运动的特征之一，是激进的反传统主义。但是今天，我们却不能不这样激进反传统主义提出质疑。

世界上那些已实现现代化国家的历史经验都表明，现代化的首要前提是经济、政治、文化获得持久、连续、稳定的发展。还没有一个国家是通过社会不断发生动力（尽管住在于“革命”的名义发生）而实现了现代化的。十九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中，我们倒看到这样的规律：经济和政治发展进程是呈现断裂而缺少连续性的过程；经济现代化进程是困难和曲折。相反地，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以和平演变、改良性渐进的模式保持连续而比较稳定发展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人民所受苦难较小，成就却比较显著。例如：美国、日本、加拿大、瑞士以及北欧诸国，都是例证。过去人们讲，只有激进的暴力革命才能解放历史。历史事实对这个命题的普遍适用性提出了挑战。以历史、文化背景为相似的英国和法国来看，过去人们总说美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而法国则爆发了1789年的大革命，又发生丁1848、1871年的革命，其间还有政治王朝复辟与反复辟的多次交涉，社会动乱指数明显地高于英国。但是，就现代化的进程和经济增长而言，英国曾长期领先于法国，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经验也表明，社会稳定、经济持续保持非断裂的连续发展，比跃进式的突变式发展更有效益。最近二百年来世界各国发展的统计模型表明：社会动乱的频率与激进

程度，同其现代化的进程恰恰呈现反比例的关系。这里似乎有一个历史规律。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十九世纪以来的世界各国中，以中国发生社会动乱的频率最高、最最高，这当然是有其客观历史原因。但结果是导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延缓。一百多年以来历史的经验表明，中国总是吃激激主义、急躁情绪的苦。这种情绪来自一百年来由于落后而造成

的民族自卑感。但结果是，社会的心理、政治系统极不稳定，经济得不到稳定连续的发展，文化成果难以积累。大量的人才、精英和物质财富在社会动乱中白白消耗、牺牲。这就是虽然具有最激进的意识形态，虽然有社会表层政治、经济发展的迅速跃进，但社会的真正进步却极其缓慢的原因。因此，反省历史，摆脱意识和政治形态中的激进主义，连接已断裂的民族文化传统，从我们民族的自身传统中，有根地培育和生长出现代文化，是今天超越“五四”的一个重要方面。

调动社会成员的自身动力

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尽管困难重重，曲折不断，但仍然呈现出不断深化的历史走向。它由文艺解冻、思想启蒙发轫，其后转人经济改革；由早期的政策转变深化为体制改革，同时由经济渗入政治，扩及于文化。但值得注意的是，自“五四”迄今，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始终有一个极大的弱点，这就是过于重视现代化进程中的物质因素和技术因素，却往往忽视了现代化进程中关于人的重新塑造的问题。

人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人。的解放问题。我们可以注意到，许多国家的历史表明，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实质首先是将人从中国传统封建依附制度和等级身份制度中解放出来，使知识分子能够自由思想，平民能够自由创造，从而使人的聪明才智和主动精神得到充分发挥的过程。

一般来说，现代文化能够从其成员自身，获得无限发展的积极力和活力。文艺艺术以后，我们在西方社会中明显地看到，首肯在知识分子中，同时也在社会几乎所有阶层中，个人创造力和主动精神获得了无比的增强。这种保证个别社会成员享有施展创造性机会的社会文化制度，是许多国家现代化成功的主要秘密之一，却远至被我们在追求现代化时所忽视的一个重大因素。实际上，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正是应当为人的个性发展提供充分可能的。人的解放、个性的解放，只有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中，才能获得真正正的实现。因为人的解放程度与社会文明的发展水平是成正比例的。

无庸讳言，直到今天，中国社会结构在许多方面仍然缺乏一个有利于精英文化发展的环境。无数英才由于得不到适宜的教育、培养，或者是崭露头角后得不到发展的充分机会，而被困囿、扼制在官僚和帮会中。这个问题在改革正在日益深化的今天，已有必要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改革应当从以往过于偏重物质方面的因素，转移到更加重视文化现代化过程中人的因素。我们应当思考如何解除那些抑制、挫伤人的发明创造力和主动性的不良制度，创造一种有利于发挥社会个中主动和首创精神的生态环境。

重建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

中国极有可能在未来五十年内获得自己的文化复兴。但是，为了要实现这一点，必须重建中国人的价值观，重新找到中国的民族精神——也就是所谓“国魂”。这种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是对中华民族和本文化——确信它可以从自身的转化中超越为社会主义的新型现代文明的充分自尊与自信。

另一方面，所谓复兴当然并非意味着复古。复兴本身就应当意味着革新。但是，我们决不能再倡导向何具有激进、非理性特征的“文化革命”，文化更新首先意味着建设、创造，在文化积累基础上的持续发展。我不同意“不破不立”。在文化上，真正的改革应当从以往过于偏重物质方面的因素，转移到更加重视文化现代化过程中人的因素。我们应当思考如何解除那些抑制、挫伤人的发明创造力和主动性的不良制度，创造一种有利于发挥社会个中主动和首创精神的生态环境。

“五四”提出了批孔、反儒、摧毁封建旧文化的任务。这一任务在后来得到了相当彻底的实现。如果以今天的中国，与东方那些曾同接受过儒学文化熏陶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南朝鲜、台湾地区、新加坡等相比，可以说我们比任何入更远离于这一传统。相形之下，今天的中国早已是在表层文化的意义上，最疏远于儒家传统的“中国族”了。究竟就得失，这个问题似乎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彻底地反叛传统并不等于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承认这些国家或地区近年来发展很快的现象，那么我们的确有必要对“中国传统文文化必须全盘否定，其与现代文明不能并存”这一激进命题表示强烈的质疑。

在这里我们应当注意，西方走向现代化的开端，是以希腊罗马古代文明的复兴为旗帜的，这并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在今天，我们同样必须重建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我们必须要通过让我们文明的价值，塑造我们民族的灵魂。这种塑造，同时也应当意味着对传统的重新认识和重新阐释。要在这种阐释中，重建现代中国人对于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尊严感和自信心。

世界历史表明，各国现代化运动（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史也如此），往往起源于文化运动，而其基础则是经济政治的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具有现代观念而能够承担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在各个领域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没有知识分子，就没有现代文明。同样，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也承担着重大的历史责任。

在社会安定和思想文化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前提下，我们将有理由期待中国文化在下一世纪得到全面的振兴。

喜读《〈资本论〉辞典》

新春伊始，我收到宋涛同志主编的《〈资本论〉辞典》。这是我国编辑出版的第一部《资本论》辞典，值得经济界和出版界为之庆贺。

这部辞典，共收辞条1632条，包括《资本论》及其手稿所涉及的范围。概念、术语、学说、人名、著作和其他方面的释文，并附有《资本论》手稿简史和注释与《资本论》、《资本论》版本、《资本论》年表等系统的历史文献资料。

编写这部辞典的，有266位有研究的学者，其中有许多人是终身致力于《资本论》研究、蜚声中外的专家。他们辛勤耕耘，六易寒暑，结此硕果，诚非易事。

《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巨著，光照环宇。现在还很少找到一本社会科学著作，具有如此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在改变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发挥出如此震天撼地的理论力量。《资本论》出版后不久，恩格斯就在《民主周报》所写的书评中称：“自地球上有人类以来，从来没有一本著作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具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63页）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恩格斯的评论是有远见的。《资本论》刚刚问世，资产阶级已预感到它的威力，开始企图用“沉默”把它置于死地，但是，失败了。后来，又对其进行围攻和诋毁，有的统治者甚至把它列为禁书，也无济于事。相反地，它却像礁石一样，越受打击，越光灿夺目。如今，某些唯事实实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承认这部科学著作的理论价值了。60年代，奥地利的《未来》杂志这样写道：“这部著作尽管发表很久了，它不仅没有被遗忘、没有被埋葬，相反，今天，

它闻名于全世界，并比任何时候都有生命力。这对于科学书籍是非常罕见的”。这个评价，完全符合实际。

中国人民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走上解放的道路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首次在我国撰文宣传《资本论》的基本思想。30年代初开始，陆续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多种译本。1938年，上海读书生出版社在政治条件十分恶劣、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出版了郭大伟、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第一、二、三卷。郭、王准备十年，伏案三载，完成此宏伟工程，劳苦功高，诚不在焉下。从此，这部巨著不断再版（有些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实为《资本论》的缩本），影响日大，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资本论》是阐明马克思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我们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没有必要对它进行钻研呢？我认为，十分必要。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致力于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资本论》恰恰是最深刻、最全面论述商品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著作。

本来，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就是通过研究商品经济及其发展规律奠定自己的基础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最高成就，是创立了劳动价值论。但是，他们对这一理论的论证是不相底的。马克思继承了他们的优秀成果，批判地证明了商品中包含的劳动二重性：探讨了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解开了货币之谜，才把

《长江长江——三峡工程论争》

戴晴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集中反映了一些专家对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旨在启发众思异议，推动科学决策。内容包括：三峡工程十大异议概述，周培源、十位全国政协委员致中央领导部门的意见和建议，首都新闻单位10个记者与李锐、林华、周培源、孙越崎、乔培新、彭德、王兴让、陆钦恒、侯学煜、罗西北、陈明绍、田方、林发堂等专家学者们的访谈录，以及千家驹、茅于軾等经济学家对三峡工程的见解。贵州人民出版社对这本书以最快的速度出版，经费由百余名科学家、作家、艺术家等解囊集资。

首钢冶金机械厂


产品简介

- 二、四级冷轧机组
- φ250~φ500 热轧机组
- H630 横辊机
- φ42~φ114 直连棒管机系列
- 板带钢及冷弯成型机组
- 钢管平头机及水压试验机
- 钢管弯管机和数控飞剪
- 水平台式连铸和数控飞剪
- 焊管机用各型轧辊（北京市优质产品）
- 校直定弯与卷弯机
- 钢筒、铸铁轧辊及铸钢辊（市重点优质产品）
- 承接冷、热轧机及焊管机生产线的设计制造并负责安装调试
- 承接铸钢、铸铁、锻钢和机加工件的新旧加工

通用于生产碳素钢和较合金钢的四辊冷轧机。采用闭式机械，电液压，性能可靠，生产率高。



二、四级冷轧



通用于生产碳素钢和较合金钢，性能可靠，生产率高。

二、四级冷轧



SY系列轧机

地址：北京安定门外大街。电挂：8021
电话：002.2552 002.2226 364

φ250~φ500 型系列热轧机及其辅助设备横切机、出钢机、剪切机、升降辊道、双辊辊道、冷床等。可轧制各种规格圆钢、扁钢、螺纹钢、型钢、异型钢等。

我厂承揽中、小型热机车间的改造工程设计和全套设备制造、安装、调试、人员培训等。投资少，见效快，适用于中小企业的技术改造。

